

#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构建研究

潘海生 汤杰

**【摘要】**标准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由标准内容和标准治理结构组成，前者分析标准的内容要素和层级，后者探究不同利益主体在各层级标准治理中的分工。对比德国和美国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发现两国职业教育标准内容均兼顾通用性职业能力和专业性职业能力的培养，标准治理结构都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开发多层级标准，但受到市场经济体制和技能形成体制的影响，两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标准体系。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内容架构初具雏形，“国家—学校”两级标准治理结构不能满足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因此，积极构建两维度三层级的现代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成为必然选择，后续还应协调多部门参与职业教育标准治理，完善更新国家职业教育标准内容；细化地方职业教育标准，加强中介组织制定的标准的权威性；提升学校专业带头人能力和校企合作水平，增强校本标准特色。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职业教育标准 标准体系 标准治理 职业能力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是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教育标准是规范和指导教育活动的准则，同时也是评价教育质量的依据。<sup>[1]</sup>在职业教育领域内，标准更是国家对于职业教育顶层制度设计的重要体现。<sup>[2]</sup>它具有通用性和权威性，能稳定职业教育办学秩序，同时也是检验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基准。因此，《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以标准建设作为突破口，发挥标准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的基础性作用。近二十年来，我国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不断完善，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特色的职业教育基本办学模式和教学模式逐步确立，这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相对而言，我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还处于相对薄弱的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廓清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框架，从标准内容和标准治理结构两个方面完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对于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 一、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框架分析

职业教育标准是标准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体现，是为了实现职业教育目标而制定的各项规范和技术规定，以此指导职业教育活动开展，确

保职业教育办学质量。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则由职业教育标准内容和治理结构组成，前者分析标准的内容要素和层级，后者探究不同利益主体在各层级标准治理中的分工。

### （一）职业教育标准的内容架构分析

#### 1. 职业教育“投入—产出”二维度的标准内容要素

按照职业教育全过程育人环节，职业教育标准可以划分为投入标准（办学标准）和产出标准（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两个维度（见图1）。投入标准是产出标准建设的基础，只有投入标准达标，产出标准才有可能达标。投入标准又可以细分为硬件标准和软件标准。其中，硬件标准包括学校设置标准、学校建设标准、安全设施等办学标准等，软件标准包括学校运行和管理标准、课程标准、教学标准、教材标准、教师队伍建设标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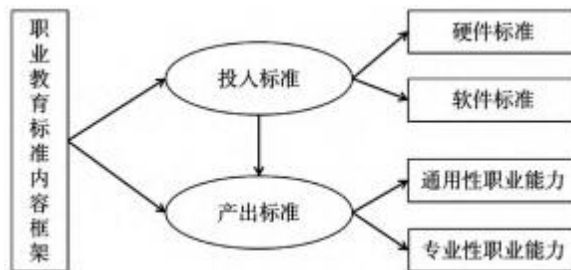


图1 职业教育“投入—产出”标准的内容架构

收稿日期：2023-08-08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谱系图研究”（20JZD055）

作者简介：潘海生，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汤杰，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职业教育产出标准（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主要涉及人才培养规格的问题，其核心是学生经过培养后能胜任工作的职业能力。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现代职业教育面临两大服务转向，即服务个体的全面发展和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的产出标准具有两个维度（见图1）。服务个体的全面发展彰显了职业教育的教育属性，落实到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上，应重点培养学生的通用性职业能力。该能力又可以细分为通识素养和专业基础能力，主要用于解决一般性或日常工作问题，服务于个体的职业转换和生涯发展，具有可迁移性。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彰显了职业教育的产业属性，聚焦到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上，应重点培养学生的专业性职业能力。该能力主要用于解决具体工作情境中高度专业性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岗位针对性，但可迁移性不强。

2. 职业教育“宏观—中观—微观”三级标准层级

标准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一般来说，按照标准的使用范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级。其中，宏观层面的标准是国家标准，反映了职业教育标准的最低国家要求，它是基础性的准入标准；中观层面的标准包括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和（龙头）企业标准，反映了地方或行业对职业教育标准的具体要求；微观层面的标准是校本标准，体现了职业院校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具体规格。

(二) 职业教育标准的治理结构分析

治理的核心在于规范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过程，维持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利益。<sup>[3]</sup> 职业教育标准的治理结构是各利益相关者在职业教育标准制定和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决策权利结构。<sup>[4]</sup> 因此，对职业教育标准治理结构的分析要明晰两个问题：职业教育标准的利益相关者有哪些？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分别负责制定和管理什么层级的标准？

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标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一般来说，职业教育标准的利益相关者至少包括政府、行业组织、企业、职业院校。其中，政府主要通过政策法规等途径对标准进行顶层设计，以此保障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质量，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并推动技能型社会的建设。行业企业以职业资格证书为抓手参与职业教育标准的制定，以此将其用人标准和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标准相对接，增强其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话语权，同时获得一批真正满足其发展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院校通过优化教育教学标准来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增强办学吸引力。

而各标准利益相关者对于标准的开发能力和开发意愿决定了不同主体在标准治理中的分工与职责，从而形塑了职业教育标准的治理结构（见图2）。中央政府参与职业教育标准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最强，同时也是职业教育标准核心利益的获得者，主要负责制定和管理国家层面的一般性标准，以此规范全国职业教育办学；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标准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适中，也是职业教育标准关键利益的获得者，因此可以牵头制定和管理地方或行业的具体标准，以此指导区域职业教育发展；职业学校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标准治理的能力有限，作为职业教育标准利益的紧密相关者，可以在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的指导下，结合自身特色，负责学校特色标准的开发、实施、管理与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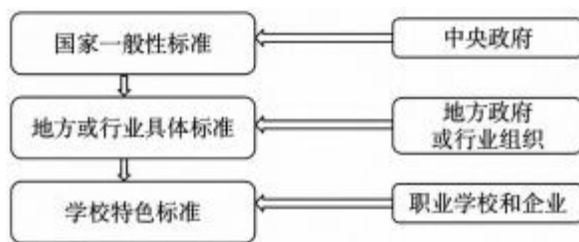


图2 职业教育标准的治理结构

(三) 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框架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框架由职业教育标准内容和治理结构共同组成（见图3），呈现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组织、职业学校和企业等主体合理分配权责，通力协作构建“国家—地方/行业—学校”三级投入标准和“职业学校学生习得通用性职业能力和专业性职业能力”二维产出标准的结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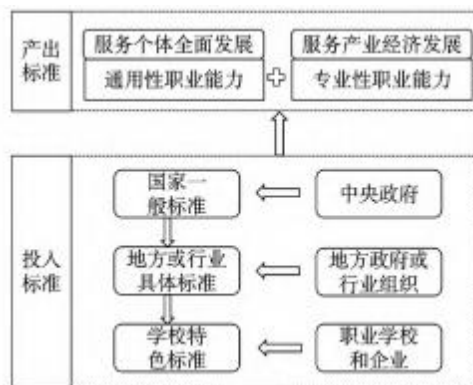


图3 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框架一般模型

二、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国别比较分析

受经济体制、技能形成体制等因素影响，国家间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具有差异性。基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研究选取德国（协调市场经济和集体

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的代表)和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的代表)的职业标准体系对比分析,以此总结职业标准体系建设的经验,以期对构建中国特色的职业标准体系有所启示。

### (一) 德国职业标准体系分析

#### 1. 德国职业标准内容:培养综合职业行动能力

德国是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作为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的典型代表,国家和企业对于职业教育的参与度都很高,形成了兼顾学校职业教育和企业培训的双元制培训模式。非市场性的劳动管理制度和管制竞争关系模式、高水平的就业和失业保障制度、成熟的技能认证体系使得企业能够不断积累行业专用技能和企业专用技能,促使德国形成高技能社会。<sup>[5]</sup>在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的影响下,德国职业标准内容重视专业性职业能力的培养。同时,受到“全面性职业教育”理念的影响<sup>[6]</sup>,包括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等在内的核心能力得到重视,最终促使德国职业标准彰显综合职业行动能力观。例如,德国的职业教育条例就致力于促进个体的综合职业能力(包括专业能力、个人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发展。整体而言,综合职业行动能力整合了通用性职业能力和专业性职业能力,充分反应了职业领域、跨职业领域和具体职业的能力要求<sup>[7]</sup>,在促进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同时,重点回应了经济产业发展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的需求。

#### 2. 德国职业标准治理:重视中介组织开发具体的中宏观标准

为确保教育职业标准能精准表达雇主的需求,德国多方利益主体参与开发“中宏观-微观”标准。中宏观标准层面,由联邦政府部门、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各大行业协会、雇主和雇员组织机构的代表等联合开发职业教育条例(双元制中的企业培训标准)和由州文教部依据职业教育条例开发框架教学计划(双元制中的职业学校教学标准)。<sup>[8]</sup>中宏观标准有三大特色:其一是强制性,职业教育条例是以法律的形式呈现职业教育标准内容,全联邦范围内实施职业教育培训的企业必须参照此标准开展工作。其二是具体性,职业教育条例又被称作教育职业标准,它对教育职业规格、教育内容(面向企业的教育框架计划)和考试要求进行详细规定,整合了职业标准、教育标准和考试标准<sup>[9]</sup>,具有很强的实操性和指导性。其三是引入行业协会等中介力量参与标准治理,这些中介组织一方面参与标准开发,对劳动者应具备的

能力作了更为前瞻和全面的考量;另一方面监督企业实施标准,完成相应的培训计划。<sup>[10]</sup>微观层面,在中宏观标准的规范和引领下,企业和职业院校,依据自身条件,分别制定企业的教育培训标准和院校教学标准,具体开展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

### (二) 美国职业标准体系分析

#### 1. 美国职业标准内容:侧重培养通用性职业能力

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国家,国家和企业对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参与度都较低,形成了以普通教育为主、短期在职培训为辅的技能养成体系。市场性劳动管理制度、自由竞争关系模式、低水平的社会保护和社会组织推动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在促进通用技能发展的同时抑制了行业专用技能和企业专用技能的积累,从而形塑了一个低技能社会。受到技能形成体制的影响,美国职业标准的开发更聚焦个体的生涯发展需求,强调核心能力与综合素养。<sup>[11]</sup>例如,2012年出台的“生涯技术教育共同核心标准”包含生涯准备能力、职业生涯群的“入行基本要求”和职业生涯通道的“入职基本要求”三部分。<sup>[12]</sup>总体而言,美国职业标准内容在兼顾具体岗位能力(专业性职业能力)的同时,更重视可迁移的通用性职业能力,为个体的职业变迁和生涯发展奠定基础。

#### 2. 美国职业标准治理:重视各州力量开发一般性标准

为提高标准的权威性,美国多方利益主体参与开发“宏观-中观-微观”三级标准。在宏观层面,由州际协同开发生涯技术教育共同核心标准,相较于德国,该标准内容并不详细具体,且各州无需强制执行此标准。在标准开发主体方面,各州及领地的职业教育管理者团队统筹标准研制,各州推荐的工商界代表、教育专家、骨干教师等构成的专家团队负责具体标准研制,由马尔扎诺研究工作实验室专家组成的辅助团队收集标准的评价和反馈意见。<sup>[13]</sup>在中观层面,则是各州自主制定不同职业路径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课程标准。例如,美国加州的课程标准主要由州教育委员会组织开发,行业、企业、社区成员等参与标准完善。<sup>[14]</sup>在微观层面,则由学校根据州标准开发校本课程标准。

### (三) 德国和美国职业标准体系的对比分析

德国和美国职业标准体系既有共性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共性方面,两国标准内容都关注通用性职业能力和专业性职业能力的培养;两国

均调动政府、行业、院校、研究团队等多方力量参与到多层级标准的开发。在差异方面,其一,职业教育标准内容的侧重点不一样。德国侧重于培养专业性职业能力,而美国侧重于培养通用性职业能力。其二,标准层次的重心、详细程度和指导效力不一样。德国的重心在中宏观标准上,且以法律的形式对具体教育职业标准作了详细规定,能直接指导企业教育培训和学校职业教育的标准开发和落实。相比之下,美国州际协同开发的宏观标准是一般性标准,标准没有法律约束,不具有强制执行的特征,向下指导力度有限。美国各州自主开发标准的权限较大,州层面开发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课程标准相对具体,能向下指导学校标准开发,但由于不是法律条例,执行效力依旧没有保障。其三,标准治理主体不一样。德国受到社团主义治理模式的影响,行会工会等团体在标准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相比之下,美国职业教育标准的开发主体还是州教育主管部门,行业企业参与力度有限。

对比德国和美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可以发现:首先,职业教育标准内容的建构应充分考虑到本国的经济体制、技能形成体制等国情。其次,中观层级的职业教育标准在整个标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应重点加强建设。再次,重大标准应以法律条例的形式出台,加强标准的执行效力。最后,应鼓励政、校、行、企和科研人员等多元主体参与标准制定和监督实施,尤其可以借鉴德国,加强社会中介团体组织在中观层面标准的治理,提升标准的质量和执行效力。

### 三、我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现状审视

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技能形成体制与德国和美国均有较大差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技能形成体制类似于“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在技能形成主体上,以公共财政支持的学校职业教育兴盛起来,企业在学校职业教育办学中参与度较低。在技能类型上,由于市场化企业治理机制和市场化社会保护制度的介入,劳动力在市场的流动性加强,个体除了要具备行业专用技能外,还增加了对通用性技能的追求。因此,我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构建应基于我国国情,在服务个体通用性职业能力和专业性职业能力发展上达到有机平衡。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既有标准体系的内容和治理结构尚不足以支撑上述目标的实现。

#### (一) 职业教育标准内容架构初具雏形

当前,面向学生通用性职业能力培养的标准包括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标准、

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大纲。面向学生专业性职业能力培养的标准包括专业教学标准、岗位实习标准、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以及代表(准)行业标准的各类证书。此外,还有部分保障性的职业教育办学标准,包括学校设置标准、建设标准、生均经费标准、教师专业标准等。

虽然标准体系的内容架构初具雏形,但面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仍有亟待完善之处。其一,尚未构建体系化的职业能力标准。既有职业教育标准内容建设主要侧重于投入标准,忽略产出标准,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界定不清,其本质是对于职业能力的内涵界定、职业能力广度与深度的划分、职业能力的表征测评等缺乏系统的研究。其二,面向职业能力培养的标准体系不健全。一方面是标准内容缺失,尤其在职业教育层次高移的背景下,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相配套的很多硬件和软件标准没有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是标准更新机制尚不健全,标准内容陈旧。其三,面向专业性职业能力培养的标准权威性不足。由于培训评价组织的行业公信力不强<sup>[15]</sup>、行业龙头企业开发的证书占比不高等问题<sup>[16]</sup>,代表(准)行业标准的证书的含金量受到质疑。

#### (二) 我国职业教育标准治理呈现出“国家—学校”两级结构特征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巩固和发展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联合行业制定国家教学标准、职业院校依据标准自主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工作格局”。目前虽有部分省份探索制定地方标准,但该举措尚未形成机制并全面推广;虽有部分龙头企业尝试制定证书代表行业标准,但高质量证书较少。总体来看,由于地方或行业的具体标准尚不完善,“国家—学校”两级标准治理结构尚未被完全打破。不可否认,两级标准治理结构在推进职业教育规模化发展的进程中曾发挥积极作用,但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其弊端也显而易见。

其一,由于区域差异过大,标准自上而下传导力度有限。我国各区域发展水平不一,产业结构不一致,地方企业技术标准存在差异,地方职业院校设置的专业不尽相同,因此国家一般性标准能为职业院校制定标准提供的指导有限。其二,院校建设能力参差不齐,部分职业院校自主制定的标准质量不高。《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由行业企业专家、教育科研人员、一线教师和学生(毕业生)代表组成的“专业建设委员会”要全程跟进

行业企业调研、人才需求分析、职业能力分析等环节，负责方案的开发和修订工作。由此可见，校本标准的开发质量至少受到两个关键要素的影响，即学校专业带头人的专业建设能力和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水平。就专业带头人能力而言，已有研究表明专业带头人是一个专业化极强的角色，现有高职院校专业带头人的专业建设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sup>[17]</sup>，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专业带头人能力受限将直接影响专业培养目标确定、课程体系设置等核心内容，降低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就职业院校校企合作水平而言，当前校企合作还存在着利益相关度差异显著、合作质量不高、合作深度不足等问题。<sup>[18]</sup>校企合作水平不高一方面导致职业院校无法精准了解企业的用人需求，继而无法制定合适的人才培养方案；另一方面，制约职业教育标准的有效转化。这是因为，企业最新的技术标准是一套生产话语体系，而职业教育标准是一套教育话语体系，从技术标准转化为教育标准再转化为具体的教育培训内容，需要企业技术专家、职业教育专家和一线职业教育工作者多次沟通协作才能完成。校企合作水平不高直接导致企业最新的生产工艺、技术和规范无法有效进入教学场域，限制职业教育质量持续提升。

#### 四、我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的优化路径

为弥合“国家—学校”两级标准治理结构的不足，应充分发挥中间层级的治理力量，积极构建“两维度三层级”的现代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见图4）。以“国家—地方—学校”三级标准为抓手，确保职业院校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授课质量，培养学生的通用性职业能力，服务于学生生涯发展，彰显职业教育的育人价值；以“国家—（准）行业—学校”三级标准为抓手，确保职业院校专业核心课授课和学生企业实习实训质量，培养学生的专业性职业能力，服务产业升级的需要，彰显职业

教育的社会价值。具体到实施层面，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优化职业教育标准体系。

（一）宏观层面，协调多部门治理职业教育标准，完善国家职业教育标准内容

就标准开发主体而言，应充分利用国务院建立的职业教育工作协调机制，考虑成立职业教育标准治理委员会，统筹教育部、人社部、其他行业主管部门、职业教育专家、行指委等主体参与国家职业教育标准的开发和更新，并及时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形式将标准成果固定下来，提升部分强制性标准的权威性，同时总结凝练标准的研制经验以便推广。就标准内容而言，应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各层级职业教育的需要，完善和更新职业教育标准内容。其一，在人才培养规格层面，不同层级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应掌握的通用性职业能力和专业性职业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澄清，核心是要基于国家资历框架构建一体化的职业能力标准体系，并将职业能力标准作为开发专业教学标准的重要依据。<sup>[19]</sup>其二，在办学标准层面，中、专、本科层次院校的设置标准、建设标准等应该进一步优化更新，明确办学投入的硬件标准；同时，更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和校长专业标准，制定专科和本科层次院校教师和校长专业标准，提升职业院校办学软件标准。其三，在教学标准层面，结合最新版的职业分类大典和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更新优化相应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教材标准、岗位实习标准等内容。

（二）中观层面，细化地方职业教育标准，加强中介组织制定的标准的权威性

一方面，各省级政府应统筹协调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各行业主管部门等，根据国家标准，结合省域特色细化本省职业教育系列标准（包括办学标准、专业标准和教学标准等）。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例如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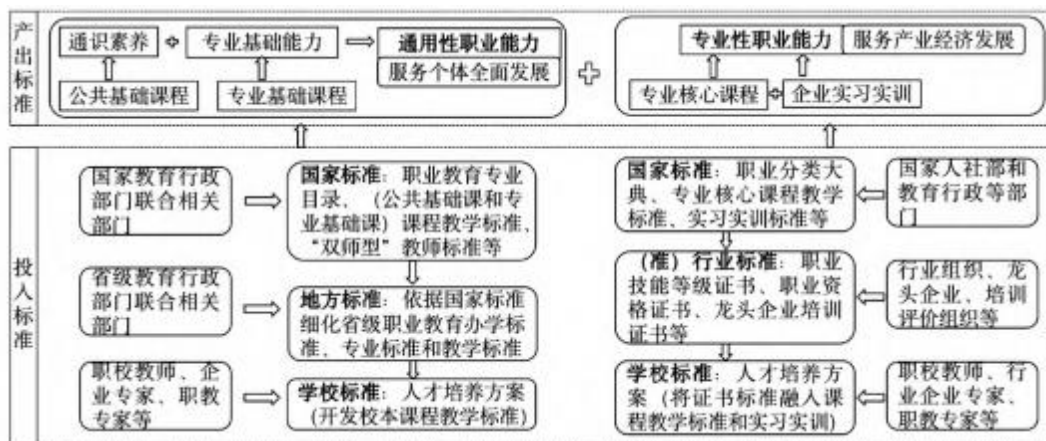


图 4 两维度三层级的现代职业教育标准体系

业组织、培训评价组织、龙头企业等在各类资格证书中的制定作用，将高质量证书视为（准）行业标准，对接产教两端，即向上对接职业标准，向下指导校本标准。为充分发挥各项证书标准的引领作用，后续还应完善如下工作：其一，通过行业公约机制明确各项证书的效力、适用范围及证书持有者的薪酬待遇，提升证书的认可度；其二，政府遴选一批具有行业公信力的培训评价组织参与证书的开发，期间尽可能吸纳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标准，提升证书的权威性；其三，政府加强对培训评价组织的扶持，对培训评价组织合理赋权，允许其在坚持公益属性的前提下适当盈利，提升其工作的积极性和能力<sup>[20]</sup>；其四，完善对培训评价组织及其开发的证书的监管和评价，考核不通过的培训评价组织及不匹配行业发展需求的证书应及时退出市场。

（三）微观层面，提升学校专业带头人能力和校企合作水平，增强校本标准特色

一方面，加强对职业学校专业带头人的培训，提升其专业建设能力，尤其注意将职业教育标准研发的技术路径纳入培训内容，全面提升其标准化工作能力。<sup>[21]</sup>对专业带头人的培训模式应由传统的项目式培训转为制度化设计，应基于专业带头人的工作任务构建能力模型，开发相应的能力标准，再依据标准开发系统化的课程，带头人接受课程培训后还要接受职业能力测评，以此确保培训质量。<sup>[22]</sup>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结合X证书的要求，将行业企业最新的工艺、技术和规范融入到学校标准中，增强校本标准的特色。具体而言，其一，将优质企业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引进校园，完善“双师”结构师资队伍建设，并引导其全程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优化课程、教学、教材和企业实习实训等各项标准。其二，职业院校主动与地方优质企业开展双边或多边技术协作，通过共建技术技能创新平台、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等方式促进校企技术创新和技术技能积累，并及时反哺优化学校各项标准建设，确保校本标准能动态更新，适应行业企业最新发展需求。

### 参 考 文 献

[1] 国家教育标准体系研究课题组，徐长发，孙霄兵，等. 国家教育标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J]. 教育研究, 2015(12): 4-11.  
 [2] 徐国庆. 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完善国家基本制度[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2): 1-14.  
 [3] 蒋凯，王涛利.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问题和推进路径[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105-114.  
 [4] 李政，徐国庆. 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结构转型：内涵、困境与突破[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 78-85.  
 [5] 杨钊. 技能形成与区域创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功能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8.  
 [6] ARNOLD R, LIPSMEIER A, OTT B.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act[M]. Berlin: Cornelsen, 1998:25.  
 [7] 谢莉花，吴扬. 由职业能力到职业课程的转化问题及对策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2022(1): 36-46.  
 [8] 谢莉花. 德国职业教育的“教育职业标准”：职业教育条例的开发内容、路径与经验[J]. 外国教育研究, 2016(8): 28-40.  
 [9] 谢莉花，唐慧.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探析[J]. 现代教育管理, 2018(3): 92-97.  
 [10] 彼得·A·霍尔，戴维·索斯凯斯. 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M]. 王新荣，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4-25.  
 [11] 徐国庆. 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开发：理论与方法[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54.  
 [12]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Directors of Career Technical Education Consortium.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on career technical core[EB/OL]. [2023-08-06]. [https://careertech.org/sites/default/files/CCTC\\_Standards\\_Formatted\\_2014.pdf](https://careertech.org/sites/default/files/CCTC_Standards_Formatted_2014.pdf).  
 [13] Marzano Research Laboratory. Common career technical core standards development project[EB/OL]. [2023-08-06]. [https://cte.careertech.org/sites/default/files/CCTC\\_TechnicalReport.pdf](https://cte.careertech.org/sites/default/files/CCTC_TechnicalReport.pdf).  
 [14] 李政. 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化治理：逻辑、困境与出路[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153-164.  
 [15] 杜怡萍. 1+X证书制度实施的要件、挑战及策略[J]. 教育学术月刊, 2020(4): 35-41.  
 [16] 张国民. 1+X证书制度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优化对策[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4): 103-108.  
 [17] 王亚南. 高职院校专业带头人能力模型构建及发展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8:166.  
 [18] 潘海生，王世斌，龙德毅. 中国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3(3): 143-148.  
 [19] 杜怡萍. 标准视阈下的职业教育专业建设[J]. 职业技术教育, 2019(5): 23-27.  
 [20] 邓子云. 1+X证书制度实施中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J]. 教育与职业, 2021(5): 20-26.  
 [21] 王春燕，邱懿. 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及优化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23(5): 94-100.  
 [22] 王亚南，邵建东. 高职院校专业带头人专业化的制度制约及优化路径[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9(2): 147-153.

(下转第 151 页)

sion, transmission, and dynamic mechanism, it is necessary to broaden the dialogue channels, promote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maintain the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order, and create an information ecolog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avoid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information asymmetry.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formation connecti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formation correction (责任编辑 任令涛)

---

(上接第 143 页)

##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n Haisheng, Tang Jie

Abstract: Standards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system consists of standard content and standard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 former analyzes the content elements and levels of standards, and the latter explores the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governance of standards at each level. Comparing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system of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t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of both countries takes into account the cultivation of general vocational competence and professional vocational competence, and the standard governance structure emphasizes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multi-level standards by multiple actors, bu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skill formation system, the two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andards systems. At present, the content structure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is beginning to take shape, and the two-level standard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state-school"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actively construct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system with two dimensions and three levels, and subsequently coordin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ectors in the governa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improve and update the content of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refine lo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strengthen the authority of standards formulated by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and enhance the competence of school professional leaders and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based standards.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 standards system; standard governance; vocational competence (责任编辑 任令涛)